

本期专题·2018年盐城市两会特刊

- 02 大交通篇：长三角城市群交通发展的新趋势
- 05 大生态篇：共建“绿水青山”的四大着力点
- 07 大海洋篇：我国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十大重点
- 10 大上海篇：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 11 大开放篇：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济纵横

- 14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

文化漫步

- 16 文化产业站上新时代的新起点

历史深处

- 18 40年时间，中国何以创造奇迹

悦读时光

- 封三 “佛系青年”只是自我调侃

编者按：光阴似箭，时光飞逝，2017年的日历已经翻过，2018年的新年钟声正式敲响。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盐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与盐城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简称“两会”)于1月2日至7日胜利召开。两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两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认真听取报告，积极参与讨论，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建可用之言、献务实之策。6天的会程，内容充实，成果丰硕。

回首2017年，盐城市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市，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市经济总量首次突破5000亿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重大转变。“五个一”战略工程在一年时间内高效落地：“一张网”快速推进，“一桶水”加快引进，“一部车”难中求进，“一片林”有力推进，“一座城”品质提升。

2018年，非同寻常，意义重大。2018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2018年盐城市两会围绕“强富美高”和“两聚一高”的要求，作出前瞻性的研究部署，奋力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两会提案多聚焦“五篇大文章”，2018年五篇大文章是五个一工程的延伸：“大交通”，强调在构建立体交通网络上展现作为；“大生态”，在提升绿色发展品质上打造特色；“大海洋”，在实现蓝色崛起上持续发力；“大上海”，在推进盐沪融合发展上加速突破；“大开放”，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上创塑优势。

本期推出“2018年盐城市两会”特刊，重点围绕两会提出的“大交通，大生态，大海洋，大上海，大开放”五篇大文章，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文章，力图站在中央层面新时代、新格局的高度，借鉴全国范围内相关产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权威媒体的视角，以及专家学者、学术论坛的观点，希望能对做好盐城市“五篇大文章”、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着重对2018年宏观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前瞻性思考，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大交通篇：

长三角城市群交通发展的新趋势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跨省级行政区域城市群之一,也是经济实力最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协作和分工不断完善,长三角城市群层面和城市层面,在交通需求、设施供给、交通发展理念和技术等领域呈现诸多新格局和新趋势,就要求区域交通和城市交通规划在既有发展路径上进行必要调整和及时应对。

各城市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态势显现。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保持稳步增长,仍然呈现向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态势。从城镇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变化率来看,人口向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走廊集聚趋势较为明显。在空间布局方面,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发挥上海市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培育形成多级、多类发展轴线。在区域协作方面,强调加快提升上海市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推动非核心功能疏解,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在城市层面,其发展更加回归人本,更加强调转型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市软实力建设等。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交通发展的趋势包括五个方面:

一、城际交通需求增长旺盛

伴随着长三角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的推进,以及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带来的区域出行便利化,城市空间功能格局在更广的范围、甚至在城际间进行组

织。大量商务、休闲、通勤客流往返于城际之间,社会经济紧密联系的地区间高频出行迅速增加,城际间出行需求日趋旺盛,初步显现区域交通城市化特征。这部分快速增长的客流主要由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承担。

毗邻地区的交通联系逐渐突破行政界限,成为经济联系的主要指向。在城际交通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系统也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区域交通通道逐渐呈现网络化、复合化发展趋势。新兴通道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突破传统之字形通道的运能限制,也将使长三角区域发展重心转移,带动相关潜力地带的发展。

二、区域枢纽格局面临重塑

长三角各城市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均质化发展趋势,区域交通枢纽格局由核心城市集聚向均衡发展将是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和交通演进的必然过程。均衡化和分工下的集聚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趋势。

1、区域机场——发展潜力、限制和多元化需求

长三角城市群航空业务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航空需求仍有较大发展潜力。航线在枢纽机场的集中化致使航空公司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航空公司基于自身差异化经营定位及经营策略,将选择不同的机场作为自己的驻场机场和枢纽机场,重新优化组合航线航班,发展多元化经营,提高自身的区域或国际竞争力。

2、港口航运——上海港转型与港口群协作发展

要求更高。

在区域及城际交通体系重塑路径方面,需面向全局的区域交通资源优化配置,新建枢纽在布局上应充分考虑与区域发展走廊和高速运输通道相结合,扩大时空覆盖范围,提升枢纽运行效率。

机场方面,应着力构建服务各大都市圈的世界级机场群。港口方面,适应国际航运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态势,构建长三角面向全球的航运资源和服务配置中心,推进长三角港口群协调发展机制改革。利用市场配置手段和航运中心信息化手段,平衡运输需求和设施能力,力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面向城镇群空间的城际客运交通系统整合。长三角城际交通体系的构建应以广义上的轨道交通为重点。

客运枢纽方面,整合既有和新建交通通道,充分挖掘既有铁路及其车站潜力,既有位于城市中心区的枢纽、铁路线路和沿线车站可视情况开行城市列车,为区域通勤和商务联系提供更加便利的可达性。

城市交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策略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空间与交通协同发展

交通系统的布局和功能与城市空间的结构形态相匹配,提升城市整体交通可达性;在局部地区或节点,贯彻TOD策略提升城市空间容量和交通系统运行效率。

二、系统整合与提效

提升整合公共交通系统。进一步明确不同层次公共交通系统的功能和设施服务标准,强化主要走廊的服务时效性,织补局域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化

服务;重视城际交通和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完善轨道交通与公共汽(电)车、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无缝衔接,保障枢纽车站附属设施用地。优化整合快速路、干路和本地化路网。创新整合传统物流和城市配送体系。

三、精细化管理

建立城市交通大数据平台,整合出行者与服务商、交通监测与信息发布、交通决策支持与交通管理等多方数据;实行交通管理差别化,针对不同等级功能道路、不同地区需求特征差异进行精细化管理;贯彻精细化交通设计和管理,挖掘和有效利用既有设施潜力;构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加强智能控制、实时诱导、智能停车等子系统建设。

最后,交通系统的发展导向应鼓励和促进低碳交通发展,加大交通需求管理力度,完善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先在公共交通领域推广。加强共享交通的顶层设计,引导共享交通有序健康发展。积极应用新技术引导交通革新。重视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在信息化条件下推广定制公交,满足出行者高品质出行选择,并以此引导交通结构优化。由效率优先向兼顾公平转变。加强老龄化社会的交通应对,重点关注步行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改造,改善老龄人口出行条件。在道路断面和过街节点设计方面,打造宽度适宜、无障碍通行环境;在公共交通系统设施方面,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改善乘车和候车条件,提高公共交通车站与社区接驳便利性。

(城市交通 2017年第4期)



○大生态篇：

共建“绿水青山”的四大着力点

把全社会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建立和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是贯彻落实“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必由之路和体制保障。我们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必须“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贯彻十九大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框架中,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就成为推动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理由有三:第一,这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问题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单纯依赖市场或企业根本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第二,这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产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单纯依赖市场和社会根本不可能提供这类产品,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现在明确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是政府的基

本职能。明确政府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有助于转变政府的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站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看,政府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环境治理。

坚持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的统一。为了有效防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政府既要利用环境规划、公共财政等行政手段促进环境治理,也要依据环境损害成本等方面的情况运用市场手段促进环境治理。政府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环境治理,可以促进外部问题的内部化,增强企业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坚持环境手段和社会手段的统一。政府在出台环境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环境治理可能带来的民生问题,要预防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目前,在环境督查工作中,尤其要提出切实可行的统筹环境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对策。只有以社会政策为托底的环境政策,才能有效推进环境治理。

坚持德治手段和法治手段的统一。在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环境治理的同时,政府必须推动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大力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在法律中确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原则和要求。

此外,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严格遵循绿色化的原则和要求,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生态型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

二、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形成风清气正的新型政企关系、政商关系,充分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理由有三: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与政府、社会不同的主体,它既是经济行为的主体,也是环境行为、社会行为的主体。现在,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社会行为对全社会的环境行为和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二是企业环境行为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变量,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的环境友好行为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现在,绿色企业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三是企业的社会行为是影响企业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不仅要履行一般的社会责任,而且要履行环境责任。现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情况是评判企业社会形象的重要标尺。

企业生产和经营必须坚持经济利润、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的统一,通过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带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引入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等绿色管理方式,促进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绿色化,降低外部不经济性给企业带来的各种风险。要做好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切实保护劳动者的生态环境权益,全力避免企业生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劳动者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和危害。要不断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带动全社会实现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要公开披露企业环境信息,虚心接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批评和监督,完善企业内部的环境治理。

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示范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国有企业要有社会责任,节能减排做得如何就是对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检验。”推而广之,国有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示范作用,直接关系着在生态文明领域中能否实现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直接关系着我们建设的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

在环境治理中,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理由也有三:一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政企分开,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自然会留出一个中间地带,而执政党不可能包揽这个领域的一切事务,这样就为社会组织留下了空间。二是环境治理涉及到的问题具有公共性、复杂性和滞后性等特征,任何一种单独的社会力量都难以独自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发挥全社会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就为社会组织的参与提供了可能和必要。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必须将构建和谐社会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统一起来,这样就要求以社会组织协同的方式推进环境治理。

在环境治理中,必须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村委会、居委会和职代会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作为行业自治组织形式的行业协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环境标准、监督企业环境行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三是充分发挥环境民间组织的作用。环境民间组织是社会力量介入和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的不足。我们要引导环境民间组织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发挥他们在开展社会环境教育、推动社区环境整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

当然,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必须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中参与环境治理,必须加强内部治理,全力避免和有效防范“社会失灵”,尤其是不能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

四、发挥公众的参与作用

在环境治理中,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参与作用。

○大海洋篇：

我国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十大重点

我国沿海区域拥有发展开放型海洋经济的优越地理区位,是具有较大开发潜力和支撑引领作用的新经济增长极。今年3月,国务院部署海洋工作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进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笔者认为,建设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的主要意义如下。

第一,有利于深度参与国际产业经济合作,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面向海洋、邻接内陆,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便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聚集,吸引其他国家先进大型装备制造业到示范区落户,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理由也有三:一是没有每个个体作用的发挥,就形成不了强大的社会合力。尽管社会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但是每个个体的行为尤其是所有个体的行为对整个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二是环境治理需要每一个人的介入和参与。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因此,环境治理必须重视每个人的主体作用。三是在环境治理中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之贯彻在环境治理中,就是要注重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发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必须从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出发,充分保障其环境权。一是要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公众应享有了解行政机关掌握的环境信息的权利,有环境信访的权利,国家应为之提供便利和保障,切实保障其知情权。二是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公众既有保护环境的义

第二,有利于全面融入沿海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带动陆海经济发展。在中国与全球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建设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就是构建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开放水平高、辐射范围广、带动作用大的对外开放新高地。

第三,有利于激活陆海经济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建设,与近几年推进的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一带一路”等建设一脉相承。把创新示范区作为海洋经济重点发展区与海洋产业集群区的相互融合,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促进蓝色经济崛起。在资源环境和发展空间约束加剧的背景下,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升产业聚集规模,

也有对环境肇事者、责任者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国家必须充分保障其监督权。三是保障公众环境决策权。公众在环境治理中有建言献策的权利。政府对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并要将其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实质性的环境政策。四是保障公众的环境参与权。人民群众有权参加一切环境治理活动,国家鼓励人民群众以适当方式依法参与环境治理。当然,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努力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参与环境治理的工作。

不同于以“多元”或“多中心”为特征的西方环境治理。我国的中国的环境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全民共治”和“综合治理”为主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法律的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发起者、决策者和监督者,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2017-12-25 中国社会科学网)

增强辐射带动能力,把示范区打造成为引领沿海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发挥产业主体带动与先行示范作用,激活陆海经济双向发展,促进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四,有利于推进陆海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沿海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伴随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产业场地、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生活设施、环保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水路(港口)、管道、航空(机场)等立体交通网络设施的完善,示范区在陆海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体系、港口群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域面积辽阔,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沿海大部分省市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产能大多超过了需求,从而压缩了一些后发地区的发展空间,使区域间的海洋产业竞争加剧,产业同质化严重。后发地区海洋经济一直存在用海方式较为粗放、近岸海域开发利用强度较大、海岸带地区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经济快速发展对海洋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工业和城镇化项目与海水增养殖、生态景观的海域使用冲突性增加。集约节约用海水平较低,因产业、人口向沿海地区聚集而导致海洋环境污染、自然岸线和自然景观受破坏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建设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区,应围绕全国“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区域示范的重点领域,依托现有海洋资源条件和基础,结合未来海洋产业发展需求,集中创新资源,科学合理选择产业发展领域。

提升示范区域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延伸上下游及相关产业链,作为示范区建设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拓展海洋产业发展空间,培植新的经济发展优势,打造蓝色经济升级版。

1.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推进全面改革创新试点,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统筹海洋科技资源,优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强化与国内外企业的科技创新合作交流,培育建设一批海洋技术创新平台,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坚持多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协同创新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进一步推进高新区孵化器、创业孵化器 etc 科技孵化载体建设,促进科研产出和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创新和技术成果高效转化示范区。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建立海洋人才智库,将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成为现代海洋高端人才的聚集地。

2. 构建蓝色生态屏障,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优化为主线,大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将“生态+”的思想贯穿海洋管理的各个方面,把海洋生态作为示范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基本导向,促进“生态+海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沿海防风林带建设力度,加大海洋湿地保护,构建蓝色生态屏障。严格落实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度,推动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海洋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和海洋督察制度,将海洋生态薄弱区纳入监管范围,围绕打造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建立海洋经济健康发展保护机制。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内海洋生态保护,强化沿岸海域海岛、海洋资源、海洋环境保护力度,强化对稀缺物种和环境脆弱海域的保护。开展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建设,建立完善的区域性海洋环境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3. 大力扶持海洋新兴产业,营造发展新业态。发挥海洋新兴产业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大资金投入,鼓励海洋科技创新,加大对海洋新兴

产业发展企业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将海洋新兴产业打造成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结合示范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科学制定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和重点方向,集中政策优势,搭建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引导鼓励其壮大发展。完善海洋经济发展体系,推进海洋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全面提升海洋经济效益。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以产学研融合企业为示范,强化海洋产业科技转化效率,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蓝色引擎。依托海洋资源及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互联网+”,进一步提升示范区海洋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的经济效益,实现蓝色崛起。

4.完善海洋产业链体系,培育高端品牌。合理调整海洋经济重点发展方向,科学促进示范区重要海洋产业链的延伸。按照海洋经济提质增效和海洋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打造中高端产业链条,推动示范区海洋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拓展中下游产业链,实现产品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精品旅游,突出海洋生态和海洋文化特色,重点建设一批知名的精品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同时不断强化海滨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海滨特色工艺品加工业、旅游衍生品加工业、海水产品加工业等产业链发展。

5.在编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过程中高度重视项目库的建设。按照国家的政策导向,注重“多规合一”,结合示范区海洋经济发展需要,在涉海基础设施、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文化教育、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综合管理等方面加强重大项目的谋划。



6.集成各种资源,协同创新激活海洋产业科技研发系统。加大海洋研发机构在人才、资金方面的投入,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培育和发展,重点围绕海洋示范区产业链部署新型研发机构,在大中型龙头骨干企业中组建实验室、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加强深蓝科技创新载体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注重发挥涉海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建设企业智慧物流体系,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加快海洋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重视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发挥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三方的力量,努力搭建三方合作运行平台,保障涉海科研团队真正实现“下海”。大力推进“基地+项目+人才”模式建设,继续深化与各级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战略技术合作,充分利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技术与人才资源,打造海洋经济示范区的新智库。通过联盟的方式实现区域的创新发展,包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创业)基地、特派员工作站、人才驿站等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支持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建设。

7.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利用“互联网+经济”推进传统海洋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推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应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改造提升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运输业等传统产业。实行高技术先导战略,形成高技术、关键技术、基础性工作相结合的海洋科技战略,加大对海洋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攻关。

8.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陆海联动优化海洋生态环境。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基本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升级装备等方式推动海洋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转型,推进相关海洋产业园区的循环发展,提升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生态+海洋技术”进步。同时大力发展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推动建立低碳产业体系。另外,在海洋产业园区、孵化园区内选(下转第十三页)

○大上海篇：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层面具有突出表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成了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中国区域政策的目标也由此更加清晰精准。新时代需要认清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内涵,并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上提出新的思路。



经过近些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份额有较大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总体区域发展差异呈现收敛态势。但是,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仍较大,尤其是省际分化较为严重,有些省份长期增长乏力,陷入经济困局,消除区域整体性贫困面临攻坚战。

在促进地带间协调发展的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城市群内部也面临诸多“不协调”的难题,如人口过度集聚,“城市病”凸显,核心城市与周边发展落差巨大。这些都是城市群缺乏协同效应的表现和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等重大举措,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标志着中国城市群协同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协调”、“协同”成为中国区域政策的总基调。

中国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十分丰富,是对区域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创新。通过多年的实践,“协

调”的定义不仅包括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更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包括区域之间按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合作格局、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有序流动与市场一体化以及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联防联控。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至少应包含如下3个主要方面。

首先,构建多层有力的发展援助机制,也就是对那些依靠市场和自身力量发展艰难的地区要提供人财物的支持。主要的政策工具有:设立区域发展援助基金、重大项目倾斜、对口帮扶以及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入。最重要的是把“扶弱济困”作为区域政策的优先选项,为集中连片特困区、产能过剩衰退区以及“乡村病”区域雪中送炭。

其次,构建规范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区域之间协调、协同的难点在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要通过建立合理规范的区域利益关系,形成区域发展的自我协调机制。目前应侧重在转移支付、税收分成、生态补偿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经验后复制推广。

最后,构建权威法制的组织协调机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建立了很多区域性合作组织,对打破地区分割,促进要素流动,实现优势互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这些组织大多为松散性的,缺乏权威的推动力量,对于区域协调的效果有限。有鉴于中国国情以及国际经验,促进地带间的协调和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必须要有权威的协调机构和相应的法律保障。(2018-1-5 人民日报海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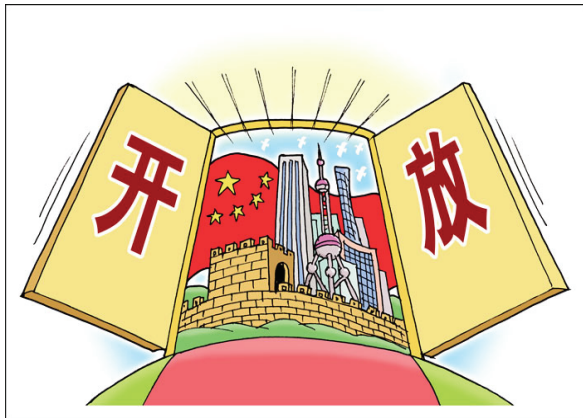


○大开放篇：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12月10日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余森杰在论坛上发表了以“国际贸易视角下的中国开放”为主题的演讲。

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对国际贸易的一点认识。我讲三点，第一，什么是开放经济试验区？第二，开放经济试验区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第三，开放经济试验区的主要内容，以及在开展试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开放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怎么做呢？建设开放经济新体制的试点地区，应该是一个重头戏。什么是开放经济试验区？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为开放经济的设定做了顶层的规划。2016

年的5月，商务部和发改委划定了10个地区，要求这10个地区因地制宜，构建综合试点方案。北大国发院有幸对这些试点进行评估，也让我们有机会去见证这次历史性的改革。

这些试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的省会城市。东部选取了济南，中部选区了南昌，西部是西安；第二类是沿海沿边城市，北边选取了大连，南面是福建的漳州和广西的防城港。第三类是五大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以及成渝城市群。每一个城市群都选取了一个或两个城市，比如京津冀城市群选择了唐山，长三角选择了浦东和苏州，珠三角选择了东莞。

如果看我们过去近40年的开放，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波。今天的经济开放试验区是第三波新的试点。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一点，在1978年到1992年之间，可以说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波，这一波的特征可以用“广度开放”来概括。国家的开放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张。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推广。比如1980年4月，我们选取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是点。1984年扩成了一条线，就是沿海的港口城市，北从大连开始，南到广西，有14个港口城市。1984年到1985年设立了国家级的特区。1985年到1988年开放了海南岛。后来继续开放了北部口岸。接着是1991年的保税区。这是从线上的一个扩张。在

1992年初，我们可以看到从线到面非常明显的扩张。这个时候不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扩展到了中部的很多省会城市。

第二波叫做“深度开放”，时间是从1992年开始到2013年为止。包括两方面，第一是设立国家级的出口加工区。我们知道中国加入了WTO，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加入WTO。这个时候中国设立了国家级的出口加工区，有几个特征，首先面积不会超过3平方公里。其次，享有原来开发区所有的权利。第三，它是在中国境内，但是在海关之外。如果你产品卖到出口加工区的话算出口。这是深度开放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13年开始的自贸试验区改革。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后来广州、天津、福建等逐渐扩张到11个城市，也是一个“点-线-面”的推进。这是深度开放的内容。

重点是第三波，也就是开放经济试验区。它跟自由贸易试验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全部适用于开放经济试验区。自由贸易区强调的是由内到外的改革，开放经济试点更强调内外联动，也就是由内到外。很难说什么是改革，什么是开放，所以强调的是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它跟自贸区相比，面积更大。比如说济南，整个城市都划为试验区，手笔更大，力度更稳。

接着我给大家汇报第三个内容，新体制，新战略。它强调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经济运行管理的新模式，所以市场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看得见的手都要有，目标是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使产品在国际竞争上具有核心竞争力。怎么做呢？有六个探索。

第一点是开放经济运行管理的新模式，探索园区协同开放的新机制，探索国际投资合作的新方式。经济运行管理的新模式主要强调简政放权。在园区协调发展的方面，一个是内涵，一个是外延。大家看到珠三角的发展比较平衡，长三角也比较好。如果我们再看京津冀，就发现北京跟天津之间

有明显区别，北三县有待继续发展。长江中游除了三个大的市，武汉，长沙和南昌以外，其他都有差距。如果我们再看看成渝，区别更加明显。如果再做区域比较，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差不多，但是其他地方有待进一步发展。所以开放试点也有推进城市各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意思。

第二点是合作投资，它除了强调要引进来，更强调要走出去。中国在2016年对外投资已经达到1961.5亿美元，超过外商对华的投资。中国的对外投资占了全球的13.5%，位列全球第二。现在强调企业“走出去”，但“走出去”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协助开发当地的资源、基础设施对外投资等。中国现在劳动力已经不便宜了，所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转移出去。

第三点，我们在做绿地投资的同时，也要学会并购投资、在做好水平投资的同时，加强垂直投资。比如以前中美，或者美日的投资更多是水平投资，是为避免高关税进行投资。现在的投资可能也要加强垂直投资。

第四点，质量提升，发展效益导向型外贸。我们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如果看看我们的GDP，中国的第二产业占了42%，这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的贸易总额是3.6万亿美元，出口是2.1万亿美元。所以加工贸易曾经占了我们的半壁江山，也就是一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印度尼西亚整个GDP。加工业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就业，但



是附加值非常低，所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迫在眉睫。怎样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呢？需要依靠双创。万众创新要把握两个方面，一个是工序的改进，一个是产品的创新。如果是最终产品的创新，可能还要依赖学校，或者是其他大型科研机构。

第五点，金融服务的开放。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我们刚刚起步。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在这里面，运输、旅游、建筑、传统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金融服务业占比非常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只占了0.8%，进口0.2%。中国的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状态，但是如果看中美服务贸易，我们是长期的逆差，附加值很低，利益所得很低，这是问题所在。

第六点，中国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比如WTO多哈回合谈判，从1999年开始，它的目标是在10年之内完美收工，但是我们已经谈了十八九年，基本上很难完美收工。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补贴这一块，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开放这一块，

都不愿意开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涉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虽然现在已经谈成了80%、90%，但是后面很难。也正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失望，很多国家都转变为双边贸易区。中国在2010年跟东盟十国成立了东盟10+1自贸区，这对我国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东盟自贸区的关税相互减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还准备做10+6自贸区，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我们把它叫做区域合作伙伴。

此外，改革要对行业、地区、对象都有所改革。比如我们原来注重的是欧美地区，现在欧盟地区比较疲软，所以应该转向金砖五国，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好，所以启动金砖五国的自贸区建设迫在眉睫。还有“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是之后开放的一个重点。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2017-12-14 思客)

(上接第九页)择龙头产业建设一批绿色示范工厂和绿色示范园区，搭建“互联网+回收”的高端智能化污染治理处理模式，推进示范区“智慧海洋”的建设。

9.加强园区产业孵化，培育海洋新兴产业集群。依托强园区建设，选取产业基础雄厚、具有广泛市场需求前景的海洋新兴产业给予重点扶持发展，同时以技术创新、园区推进、产业孵化等举措促进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利用智能立体交通体系网络，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推动海洋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领域，全面对接《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走军民融合之路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以大力发展工程船舶、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业为重点，积极发展深海勘查和开发设备、海洋新能源开发设备、海水利用成套装备等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业，推动海洋装备制造业朝着超深海技术、高可靠性、高性能、水下生产系统的发展方向迈进；在海洋服务业领域，将示范区作为重点发展区域，建设以海洋资源与经济数据库、海洋管理信息数据库为基础的近海地区“智慧海洋”服务体系，为现代海洋产业科学发展提供支撑。

10.延伸产业链条，助推海洋特色高端产业发展。根据示范区现有的海洋产业，结合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方向，海洋产业链的延伸可以朝以下方向展开：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形成的特色产业方向；依托深水港口开发形成的临港产业方向；依托海洋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发展形成的新兴产业方向；依托滨海旅游、现代服务、加工制造、现代农业形成的城市功能方向。

(2017-9 中国海洋报)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7年已经过去,回顾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一,经济增速企稳。17年,中国GDP增速有望达到6.8%-6.9%,比16年的6.7%略有回升,虽然回升的幅度不大,但这是2010年以来中国年度经济增速首度出现企稳回升。外需明显改善。从需求来看,17年经济的企稳回升主要归功于外需改善。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下,17年中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8%,远高于16年的-7.7%。17年前三季度外贸部门贡献了0.2%的GDP增速,比去年全年的-0.4%高出0.6%,是经济企稳的主要贡献。

二,消费保持稳定,投资继续下滑。在内需当中,消费已经成为中流砥柱。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望保持在10.3%,与16年增速基本持平,消费贡献的GDP增速保持在4.5%左右。而17年的投资增速预计从8.1%降至7.2%,前三季度投资贡献的GDP增速也从2.8%继续降至2.3%。

三,工业价格大涨、通胀保持低位。17年,宏观上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供给侧改革,受益于去产能,工业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估计全年PPI涨幅有望达到6.3%,远高于16年的-1.4%,扭转了工业品价格连续五年通缩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食品价格下跌,17年的CPI预计降至1.6%左右,通胀保持在低位水平。

四,企业盈利改善。受益于经济企稳和工业品价格大涨,2017年的企业利润出现明显改善,全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望达到20%,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



展望2018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以下几大挑战:

一,汇率升值与出口。IMF预测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3.6%升至3.7%,全球复苏有望延续,但仍远不及全球金融危机以前5%以上的经济增速,意味着这一轮全球经济是温和复苏而非强复苏,而世贸组织预测的17/18年全球贸易增速均不超过5%。在这样的背景下,汇率的变化会对出口有比较大的影响。16年人民币汇率贬值7%,对17年出口的回升有重要贡献。但17年人民币升值了6%,18年的出口还能不能继续高增?

二,利率上升与内需。而从内需来看,利率是决定总需求的重要变量,而且是领先变量。本轮利率下降始于14年,而14年的经济还在继续下滑,到15年下半年经济才出现改善的迹象。而17年全年各类利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其中10年期国债利率从3%升至3.9%,5年期AAA级企业债利率从4%升至5.4%,房贷利率从4.5%升至5%以上,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从5.4%升至6%左右。本轮利率的回升始于16年下半年,在利率持续大幅上升2年以后,18年的内需还能不能保持平稳?

三,房地产与投资。虽然17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但是分类来看,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变化不大,而17年地产投资增速有明显改善。从结构来看,受益于棚改货币化安置,17年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超预期,而地产投资的主体也在三四线城市。但由于利率的持续上升,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在17年4季度开始明显降温,那么18年的房地产销售和投资能否保持坚挺?

四,房地产与消费。17年全年消费增速保持平稳,但其中房地产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高于下半年,源于上半年全国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长17%,从而拉动了家电、家具、装潢

等地产相关消费的高增;但到了下半年全国地产销售增速基本归零,地产相关三大消费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而房地产影响消费的另一渠道是财富效应,受益于17年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大涨,相关消费也明显提升。但从70城房价走势看,11月房价同比涨幅已经降至5.4%,远低于7月的9.1%和16年的10.5%,如果18年房价不涨了,对消费会有什么影响?

五,商品价格与企业盈利。2017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明显回升,在需求侧主要归功于外需和房地产,在供给侧主要归功于去产能。展望2018年,钢铁、煤炭等行业的5年去产能目标有望提前完成;而在需求方面,利率上升和汇率升值将对内外需形成挑战,总需求将重新面临回落压力,供需的边际变化意味着商品价格涨幅将趋缓甚至下降,这将对工业企业盈利形成挑战。

六,加减杠杆与传统工业经济。而所有这些经济挑战的背后,核心的变化在于经济到底是要加杠杆还是去杠杆。虽然过去几年供给侧改革改善了商品价格,但经济的企稳回升还是要归功于总需求,而这背后依然是依靠出口、地产、基建这些传统需求在拉动,依赖于13%左右的社会融资增速、20%左右的居民信贷增速和35%左右的信托贷款增速。如果18年我们下决心去杠杆,保持利率和汇率的高位,严控银行表外和居民杠杆,那么传统的工业经济是不是又会再度下滑?

2018年的希望在哪里?我们认为在于转型与创新、在于提高效率:

一,居民消费的转型与升级。在30年以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一无所有,大家要追求温饱小康,把衣食住行等消费放在首位。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以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汽车、家电等物质消费已经基本满足,未来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转向科教文卫等无形消费。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但是收入增速还在上升,大家不需要更多的房子和车子,而是更高质量的房子和车子,这也是在今年汽车销售整体低迷的背景下,SUV和新能源汽车依然高增的主要原因。

二,制造业升级与创新。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是制造业,未来制造业依然是立国之本,但是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

过去在人口红利和城市化加速的时代,我国制造业以重化工业为主,在带来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但是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未来要打赢防治污染的攻坚战,制造业就必须进行大力度的环保改造升级。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居民对高质量的要求,创新将取代规模扩张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中国目前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的行业,诸如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制造业将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服务业大发展。受益于现象级的《战狼2》还有《芳华》等票房的大卖,17年的电影票房增速有望重新回到20%。17年,阅文集团在香港上市,说明中国居民已经愿意为阅读付费,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付费收听喜马拉雅、得到等APP。日益庞大的中国海外购物军团、马拉松奔跑队伍、奥数考试大军、直播网红、快递,以及小区门口越来越多的宠物店、连锁鸭脖店等等,方便出行的滴滴与摩拜单车,包括改变支付习惯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以及巨大的腾讯和阿里集团,都说明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广阔的空间。

四,破旧立新,价值为王。我们2018年宏观年报的名字是《破旧立新》,认为随着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进入尾声,以地产为龙头的旧经济、旧产业,以及以货币和规模扩张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将被打破。而进入新时代,居民消费的转型和升级将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创新和效率提升才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之相应,靠买房等投机致富的时代将成为过去,而只有真正创造价值的资产才值得未来拥有。(2018-1-2 华尔街见闻网)

文化产业站上新时代的新起点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明确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思路,不仅是2017年文化产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今后一个发展周期的新起点,是文化产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寻求新的坐标定位的开始。

与此同时,当我们拨开纷繁的文化产业事件的表象看向本质,也会发现在这一年当中,不论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新动向的形成、文化消费的渐次启动,还是新业态的持续升温,都显示出了产业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而在贯穿全年的防范金融风险、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的过程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企业的身影,则让这一年的产业发展落脚在“规范”二字上,意味深长。



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报告还对新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概括。在文化产业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and 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明确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成为业界的重

点工作。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已经初具规模:2016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14%;2012年以来,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量的贡献率平均达到了6%,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以此为基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应是业界的共识与追求。

“大会”助力区域发展新格局

2017年的年中和年尾,长三角的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举行了高规格的“文化产业发展大会”,如果再算上年中北京市举行的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会议,那么,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个主要经济圈中有两个都在以“大会”的形式谋划文化产业发展。

这些“大会”的共同特点是规格高于以往,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有一系列政策出台。浙江省在2017年8月举行文化产业发展大会,浙江省副书记、省长袁家军参加并讲话,要求打造全国文化内容生产先导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文化产业新业态引领区;上海市在2017年12月举行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参会并强调,文创产业是上海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加快文创产业创新发展,是事关上海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2017年8月,北京市召开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首次以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出席。这一领导小组下设一办七组,其中包括产业发展组。

综合来看,以这种高规格会议或组织机构的形

式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都出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的经济发达地区,对文化产业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得更加深刻,也决心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化消费:在宏观大背景向好下步入收获期

2017年2月,文化部办公厅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次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山西省太原市、江苏省苏州市等19个城市位列其中,加上第一批第一次26个试点城市,自2015年开始启动的该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拥有45个试点城市。

在文化部、财政部的共同指导下,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申报、评审、监督、验收等工作都有一整套方案。在试点过程中,大部分城市做到了因地制宜,围绕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推进惠民便民措施、提高文化消费便捷度、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等方面积极开展试点工作,成效显著,涌现出了诸多好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的新进展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中消费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明显快于投资增速;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31.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及消费理念转变,带动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占比提高,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0.2和0.5个百分点。可以预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8年的文化消费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创新引领:“文化+”作用初显

自文化产业进入转型提质升级的新阶段以来,创新引领就一直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一产业内生的发展趋势随着2016年底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得到了进一步确认。2017年,在创新的引领作用下,新型文化业态发展强劲,表现为发展环境持续向好,“文化+”不断释放动能,与此同时,利用新



型文化业态的发展优势,国内文化企业开始布局国际市场。

在发展环境向好方面,2017年3月,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发布手机(移动终端)动漫国际标准(标准号T.621),这一标准由中国自主原创、主导制定,是我国文化领域首个国际技术标准,其正式发布是文化领域中国科技、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2017年4月,文化部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针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性、指导性政策文件,向全社会发出了鼓励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明确信号。

在2017年当中,“文化+”动能的释放,不仅表现为文化与旅游、体育等产业的融合进一步深入,更体现为与农业、制造业等一、二产业的结合,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进步,在现阶段的“文化+”,产业之间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文化产业从发挥助力作用发展到成为主业。一个代表性的事件是,2017年10月,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时提出,腾讯未来的战略是科技加文化。

与此同时,在某些新型文化业态上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国内文化企业跨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产业链的势头在2017年已经出现,收购产业上游企业,并以全球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调配和布局的中国文化企业已现雏形。

落脚规范与约束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在2017年那几桩引起不小轰动的

40 年时间,中国何以创造奇迹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多个前所未有的奇迹: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最大规模和高速的工业化、持续时间最长的高增长、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的完全和平崛起。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复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绝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和涵盖。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和改革开放时面临的时代因素,更有特定时期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甚至还要如同当年的美国崛起一样,要有一点运气。

基因性因素

中国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劳。二是高储蓄率。三是崇尚实用理性、选贤任能带来一个务实的高质量官僚体系。四是独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这决定了民众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维持温饱。由于靠天吃饭和自然灾害频繁,也令举国上下养成了节俭和高储蓄的传统。同时由于长期的国家统一过程(春秋战国)和超大规模导致的治理难度,使得实用理性、贤能政治成为中国的传统。这一

资本市场事件中,都有文化企业的身影闪现,这让2017年的文化产业发展或多或少地落脚在了规范与约束两个关键词上。

几乎贯穿了2017年的龙薇传媒事件是对文化产业资本运作加强监管的最明确信号。这一事件可以说是给近几年来已经有疯狂之相的文化产业资本运作一记当头棒喝,也毫不留情地戳破了部分文化公司虚幻的资本泡泡。在强化监管的同时,相关制度规则也在持续完善中,2017年9月,证监会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并购重组信息披露规则,缩短停牌时间,限制、打击“忽悠式”“跟风式”重组,业界普遍认为,

方面体现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上,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高质量、实事求是的官僚体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和地理条件,使得中国政治成为各大文明的例外。这包括民本、无宗教的世俗社会、政治权力为单一中心。同时代的文明要么是希腊的民主,要么是忽视民众利益的“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要么是宗教、贵族和政治权力三个中心博弈。事实上,中国的文明基因并不仅限于这几个方面,比如“必须不断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国文明之初就已经产生。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以上四个最重要的基因性条件在中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有着庞大受过基础教育的勤劳劳动力,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巨额的资本以及抗击各种危机的能力,而高质量、务实的官僚体系则令中国能够与时俱进迅速适应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与影响,二是可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艰难和必要的改革。这两点,西方至今都没有解决。

这对文化传媒板块频发的重组、收购等影响甚大。

如果说以上都属于“硬约束”,那么,2017年,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软约束”也在形成。举例来说,在文化企业“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原则指导下,2017年,有过多次由观众发起、媒体跟进的对影视作品质量、题材等进行的探讨,并最终引致对高片酬、无演技、不专业等现象的反思和批判。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软约束”,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的一种体现,随着文化消费的进一步扩展,预计“软约束”在未来会发挥更大作用。(2018-1-3 中国文化报)

历史性因素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有三个方面的：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再度恢复统一和主权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过去不同的是，这种有效管理直达过去皇权时期鞭长莫及的乡村基层。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组织性、纪律性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它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成功改变了中国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会的高度组织性，使得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

二是国家主导下的全方位建设。工业上，以压制农业为条件的强制性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军事上成为核国家，确保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农业上，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今天95%以上的水坝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设的；教育上，通过大规模扫盲，令识字率上升到90%，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满足需要的劳动力。除此之外，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化，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顺利推行创造了条件。

三是治国的经验教训和意外后果。这包括对计划经济的清醒认识、“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两次对地方经济放权、文革灾难反促成了改革的高度共识。中国传统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前三十年却有中央和地方的两次分权。从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总产值比重从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29%上升到55%。大跃进失败后，又开始收权。文革期间，中央权威受到极大损害，社会失序造成事实上的权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了各自比较独立的经济管理体系。这些都为改革后的放权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之所以比前苏联东欧、印度更早更快更成功（印度九十年代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很重要的历史性原因即在此。

时代因素

改革开放启动时的时代条件则包括：一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开始在全球进行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当时西方对新市场的渴望难以言述。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建国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不是总理）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简直不可思议。假如今天再有国家要搞改革开放，就难有中国当时的条件。

二是冷战仍没有结束，中国和西方成为对抗苏联的盟友，获得了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以及外交支持。比如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海战，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沉默，反倒是苏联一边倒的谴责。这和今天俄罗斯保持沉默、美国积极谴责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人物的贡献

至于特定时期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则当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看，不乏起义和革命，但改革却极难成功，改革者功成而退的更是几乎没有。然而，邓小平却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第一人：不仅在世时力推改革成功，离世后更打破人亡政息的传统，它开创的事业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复兴。

这和他特殊的时代和经历密不可分。早年留法看世界、长期残酷的革命经验、建国初期的成功与失败、文革前后的起伏。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他兼具两样优势：既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了解体制的运作，而且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人脉，又由于文革被打倒而脱离体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这就是常人所讲：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

简而言之，邓小平1978年复出后三次挽救了中国。一是把中国从极左的道路和氛围中解脱出来，抓住全球化和西方对外技术转移的历史机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二是1989年果断粉碎了来自右的、试

图把中国导向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模式上的尝试。三是1992年面对左派重新崛起试图把中国带回老路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南巡,彻底击溃了左派的回潮,重启改革。至此,中国彻底摆脱保守左派和激进右派对改革开放的阻挠和干扰,改革开放也由此进入坦途,二十余年来再无此前左右对峙时的曲折和波动。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能够打破人亡政息的最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他政策的成功,而是他把所有正确的改革举措都制度化。比如政治上从一人决策、终身制转向集体领导、任期制。特别是任期制,在中国五千年政治史上都没有,邓小平却做到了。

中国的运气

最后一个因素则是中国的运气。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一是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不仅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和地位,更对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中国及时提了醒。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总结的:“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授课’——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的东南亚危机,我们没有对我们所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做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也有类似的效果。只不过那时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强大,抗冲击力和承受犯错的能力大大提升,和1997年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2001年恐怖主义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头号挑战,中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和西方结盟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中国反成为遏制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包括前苏东集团在内的转型国家表现最为成功的,其发展势头引发了西方的高度担忧。

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政府一建立,就把主要力量放到遏制中国身上。恰在此时9·11恐怖袭击发生,美国再度和中国结盟共同反恐。自由派学者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这样评论此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实在是太幸运了”。事实上美国的重大战略失误不仅给中国创造了机遇,更严重损害了它的软硬实力。

三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政治效应。阿拉伯之春迅速演变成残酷、混乱的阿拉伯之冬,震惊了世界,也震醒了世界。它以军事政变、内战、无政府状态、伊斯兰国崛起和难民惨剧的活生生现实否定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更印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合法性。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迅速缩小,倾向西方的群体日益边缘化,其挑战国家发展道路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其实这个效应在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也令2008年年底他们发起的最大规模向西方政治学习的举动成为历史闹剧。

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好运气依然在延续。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College)的中国专家凯利·布朗(KerryBrown)就认为美国选出一个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更大空间施展影响力的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运气。他写道:“美国选了一个每天都证明这个国家的信心和政治影响力都在走下坡的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软实力的贡献,胜过中国花了亿计金钱以及600家孔子学院所发挥的政治宣传。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环保、多边外交的态度,为中国敞开了几年前所难以想像的空间,方便施展它的影响力。”事实上布朗的点评并不到位,特朗普最大的贡献是令全球质疑和反思为什么西方的制度会有这样的结果?类似的质疑还有:为什么英国的公投是如此荒唐、既害人也害己的结果?

综上观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前无古人的成就和奇迹,固有偶然因素,但根本的还是自身雄厚积淀的文明与时代激发的结果。在竞争如此激烈、时机瞬息万变的苛刻历史条件下,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仍然绽放出其强大、潜能难测的生命力。

(2018-1-1 观察者网)